



二十世纪全纪录

1970

周丽琼 主编

目 录

中国部分	1
世纪回眸	1
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	1
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	3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3
毛泽东表示：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4
高等院校开始招生复课	6
庐山会议	6
徐海东逝世	13
“批陈整风”运动	30
中央组织宣传大权落到了四人帮手里	31
王进喜逝世	32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38
中央下大力整顿市场秩序	47
1970年结束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48
小资料	50
世界部分	53
世纪回眸	53
人类将第一辆月球车送上月球	53
第九届世界杯在墨西哥举行	54
美英出兵镇压特立尼达——多巴哥军队起义	56
三岛由纪夫自杀	57
美国入侵柬埔寨	58
西哈努克国王被废黜	61
条形码的最终作用	70
加加林进入太空	72

奥伊勒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	76
乌夫奈斯教授作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奖致词	79
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	81
1970 年美国职业安全卫生法	83
小资料	126

中国部分

世纪回眸

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

全国计划会议召开，3月21日结束。各地区、各部门以及11个大军区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拟订了1970年计划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专题座谈了军工、劳动工资、基本建设、体制改革等问题。

在我国国民经济稍有好转的形势下、以备战为指导思想召开的。会议提出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是；狠抓备战，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强大的战略后方，改善布局；大力发展农业、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狠抓钢铁、军工、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加强协作，大搞综合利用，积极发展轻纺工业；建立经济协作区和各有特点、不同水平的经济体系，做到各自为战、大力协同；大力发展新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促进国民经济新飞跃，纲要（草案）提出，1975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800亿4000亿元，钢3500万3800万吨，原煤4亿4.3亿吨，铁路货运量9亿10亿吨，粮食6000亿6500亿斤，棉花6500万7000万担；五年合计基建投资1200亿1300亿元。纲要（草案）还提出，

在“四五”期间内，各省、市、自治区要力争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要求；按农业人口平衡每人一亩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在全国形成大中小相结合、星罗棋布，各自为战的钢铁工业布局；力争在1972年扭转北煤南运的局面。

纲要（草案）强调，1970年和第四个五年国家建设的重点是大三线战略后方。1970年计划用于大三线的建设投资和大中型建设项目均占全国计划内投资和大中型项目的一半以上。并提出，“到1975年，大三线地区将建成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各有特点、工业和农业直辖市发展的强大的战略后方”。为了适应备战的需要，纲要（草案）还提出，在全国划分西南、西北、中原、华南、华东、华北、东北、山东、闽赣、新疆十个经济协作区，尽快地建立各有特点、不同水平、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各省、市、自治区要在最短时间内，做到粮食、油料自给有余；一般轻纺产品，在“四五”期间内要逐步做到省、市、自治区自给。这次会议还继续批判所谓“条条专政”，要求加快企业下放的步伐。

根据“四五”计划要求，会议确定1970年工业总产值2100亿元，比上年增长17%；基建投资228亿元，比上年增长46%；大中型建设项目1113个；财政收入580亿元，比上年增长12%左右；粮食4500亿斤；棉花5000万5200万担；钢1600万1700万吨；原煤2.8亿2.85亿吨；铁路货运量5.8亿6亿吨。

在同年8月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批准了1970年计划，同时将部分修改的“四五”计划纲要（草案）作为参考文件，在会议上印发。1971年3月，中共中央将此纲要（草案）作为参考文件，在会议上印

发。1971年3月，中共中央将此纲要（草案）中主要计划指标作为1971年计划的附件下发。由于指标过高，难以实现，1973年以后曾多次进行调整。

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到会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4月11日，林彪别有用心地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次日，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在此前后的半年内，毛泽东6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但是，林彪却始终坚持要设国家主席。5月中旬，他同吴法宪谈话时仍然强调，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个头。7月间，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鼓动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该组织在1967年8月间进行秘密活动，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对此，毛泽东在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

“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捣乱和破坏，清查“五·一六”集团的斗争不仅严重扩大化，而且演变成为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毛泽东表示：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4月28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越南（北方和南方）、柬埔寨、老挝三国四方最高级领导人会议。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并且把这种支持看作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原文：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

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

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十天，就得到近二十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

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北美、欧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

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高等院校开始招生复课

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高等院校开始招生复课。文件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在教学中，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所谓“改革”不仅在大学中，而且在中学中造成了教学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下降的后果。

庐山会议

8月23日至9月6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林彪一伙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按照事先的密谋，由林彪在全会开幕会议上发表称赞毛泽东的天才、反对所谓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的讲话，随后在小组会上，分别在各组同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过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这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表面化。陈伯达抢先作了吹捧

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等的发言，这个发言记入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从而引起了一场混乱。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打击。

庐山会议实际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它的命运隐含了或者说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

庐山会议是历史上党内斗争消极因素发展的高峰，另一方面标志着党内斗争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政治经验，而且打通了走向文革的道路。在庐山会议以前，以反左右倾机会主义为主线、历史上曾有过多次重大的党内斗争。从总体看，党内斗争为纠正错误路线，错误倾向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党内斗争并不总是积极因素占主导地位，有时恰恰是消极因素占了主导地位，比如王明路线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就是如此。而且在积极因素占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往往伴随着消极的因素。比如在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中就酿成了西路军的问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发生了所谓的“抢救运动”。问题还在于，党内斗争的消极因素、阴暗因素不但始终没有完全消除过反而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有时是潜在地、有时是明显地发展着。从王明时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延安整风时期“抢救运动”中的“逼、供、信”五七年反右时期大批党员被“扩大化”处理，可以大致看出消极因素的发展轨迹。到庐山会议，消极因素的发展达到了高峰。其标志是：主要领导人的个人好恶、个人倾向成了判断是非的标准，个人权威完全凌驾于党的权

威之上；将正常的不同意见表达上升到了不可再高的路线斗争的高度，另一方面将严肃的高层党内论争变成了无聊的、一边倒的人身攻击和批判。但庐山会议绝不仅止于此，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突破”的标志是：“机会主义者”开始变成“反党集团”；党内论争变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将对付敌人的方式搬到了党的高层内部，从而使党内斗争从方式到性质都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旦获得了全党的认可（不管是自愿还是不自愿），这种斗争“新经验”一旦为全党接受（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就必然要在更广大的范围发展开来。“文化大革命”的“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正是庐山会议的逻辑发展、“庐山经验”在全党全国范围内的应用推广。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是从对所谓《海瑞罢官》的要害——为彭德怀反案的批判切入，那末，庐山会议的要害就是为文革在全党范围内打倒“走资派”提供了武器，为全国性的批判造反运动架起了祭坛。

庐山会议将个人崇拜推向了高峰——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也就同时授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权杖。在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毛泽东在全党逐渐树立起巨大的个人威信，这种威信的树立和他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分不开。但也必须看到，伴随个人威信的确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倾向也在滋长。特别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三大改造的完成、一系列建设成就取得，对毛泽东宣传的突出和加强，个人崇拜就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自己讲要有个人崇拜，有的高级领导人也有意识地推动这种崇拜。如刘少奇就曾坦言：“我这个人历来是

提倡‘个人崇拜’的……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对个人崇拜的提倡和推动逐渐在党内形成一种默契，惟毛泽东的态度是瞻。合作化的错误、大跃进恶果，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全党上下惟毛泽东态度是瞻造成的。尽管如此，在庐山会议以前，还不能说毛泽东在党内树立了绝对权威，也才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和张闻天的长篇发言，才有“彭黄张周”公开“反对派”的出现。但经过庐山会议较量以后，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就正式树立起来，后来又经过林彪等人的“大树特树”，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全国的绝对权威地位就确立了，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换种说法，没有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林彪、“四人帮”的能量即使再大，这场矛头针对多数老干部的文化大革命也难以发动起来，更难进行下去。

在庐山会议上，除林彪等别有用心者以外，党内其他高级干部对彭德怀等人一边倒的批判，也就同时为自己种下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打倒的种子。庐山会议开始定的基调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但在分组讨论中不少与会者强调了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要求深入纠左；还有不少与会者则认为纠左已经过头，泄了群众的气。彭德怀当然属于前者。他在会议上发言以后，感到言犹未尽，也对不少同志的左倾情绪深表忧虑，希望和毛泽东本人深入透彻地交换一下意见，以利于会议更好地总结经验教

训。在这种情况下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给这封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并批示印发参考。于是，围绕彭德怀的《意见书》，会议争论逐渐热烈，大致形成支持、反对和基本同意信的内容又不赞成信中某些提法等三种意见。张闻天在表示支持彭德怀观点的同时，还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理论上作了系统分析。但从毛泽东正式在会上发表尖锐讲话以示反击后，会议倾向就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出现了“一边倒”的批判趋势。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从24日起的小组会，就成了对彭德怀、张闻天的揭发批判会。连原先对彭信内容有同感或发表过类似观点的人，也纷纷收回自己的话，以示“划清界限”。“人们怀着保卫毛泽东威信便是保卫党的路线的信念，同时也是对自己立场的考验的心情，参加了这场斗争”。由于黄克诚、周小舟先是支持彭德怀，后来又沒有顺风转向“反戈一击”，加上两人在毛泽东发表“反击”讲话后的当天晚上还有“非组织活动”的嫌疑，便被很快划为彭张联盟成员，成了批判对象。在一边倒的批判声讨声中，彭、黄、张、周被迫作了检讨，承认错误。毛泽东联系历史说彭德怀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批判斗争进一步加码。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将彭、黄、张、周的问题定性为“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路线的错误”、“反党集团”。后来在北京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追查了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追逼了以彭为首的“反党军事俱乐部”。大会通过的决议将彭、黄进一步说成“是十足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篡军、篡党、篡国的阴谋由来已久的”。纵观庐山会议及不久召开的

军委扩大会议，除林彪、康生等极少数人有意识地利用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以售其奸外，其他包括刘少奇在内绝大部分参加会议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或是违心被动地、或是自觉主动地、或是半被动半主动地但都是不约而同一边倒地参与了这场是非颠倒、无中生有的党内斗争，而且不少人前后立场的转变之快令人惊讶！竟没有一个人敢以“舍得一身剐”的精神对这场斗争包括通过的决议提出非议！这也就逻辑地注定了其中大多数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承受类似灾难的命运。因为既然庐山会议能莫名其妙地给彭德怀等人扣上“反党集团”的帽子而打入政治冷宫，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不能以莫须有的“走资派”罪名将大批老干部都打倒呢？既然在庐山会议上许多党内老战友能对彭德怀等人穷追深挖，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小将”就不能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并“踏上一只脚”呢？所谓纵容罪恶者到头必受罪恶所祸，何况推波助澜者。需要指出的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所以遭到如此冤枉的对待，也是1958年他在主持军内反教条主义“错误斗争的‘合乎逻辑’的延续和发展”。1958年在军内反教条主义中，由彭德怀主持对肖克等人所谓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斗争，给肖克等做出了类如“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的正确路线开展猖狂进攻”、“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反党反军委领导的宗派主义活动”等错误结论，伤害了军内一批同志，其中包括深受世人尊敬的刘伯承元帅。转年彭德怀就受到更为不公正的对待。所谓“...错误的逻辑方法和结论一旦形成，就必然地会扩而大之的起作用；”“斗争之火，烧错了别人，反过来也会烧到自己身上。”

庐山会议置党法于不顾，文化大革命当然就可以置国法于不顾；文化大革命践踏宪法是庐山会议践踏党章的必然发展。按照党章，党员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包括最高领导人提批评建议是其应有权利。但长期以来这个权利履行得不好。建国以后这种权利由于种种原因更难履行，特别是批评党的核心领导人更为犯忌之事。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就触犯了这一大忌。但彭德怀的做法毫无疑问是在党法范围内的合法行为，何况他还是政治局委员、战功卓著的共和国元帅。无论采取会议发言、书信表达或当面交换看法的形式，于情于理都应无可指责。但由于个人崇拜的发展，当时已接近神圣不容侵犯的毛泽东却容不得彭德怀那直爽的批评，更容不得彭德怀以上书形式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及相当一部分与会者把这看作是对领袖权威的公然挑战，是一种“犯上作乱”行为，于是加以批判斗争，结果保住了领袖神圣的面子，却践踏了神圣的党章。然而党章既能被党内高级干部随心所欲地践踏，那末国法也就理所当然应该遭到蔑视。果然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践踏了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法律，冲击国家机关、武斗夺权、打砸抢、逼供信、大批大斗、抄家游街不受约束。直到这时，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才深深尝到无法无天的恶果，才想到维护法律的尊严，但为时已晚。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7年面对红卫兵侮辱义正辞严地诉诸宪法而后者却根本不屑一顾，其根源就在于宪法在此以前就早被亲手制定宪法的人褻渎了。

庐山会议以后，随着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地位的上升，主导文化大革命的党内格局逐步形成。1966年，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党的历史、共和国历史上最悲惨

的一页开始了。经过大迫害、大动乱和几次生死存亡的较量后，到1976年，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风云人物先后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留下的却是浑身伤痕、积弊重重、冤狱遍地的烂摊子。教训之深令人难以言表。

徐海东逝世

徐海东(1900—1970)名元清，湖北省大悟县新城徐家窑人，出身于窑工之家。9岁，入乡塾读书，13岁因反抗富家子弟欺凌，遭塾师斥责，愤然退学，进窑场学艺，跟随父兄，以窑工为职业。

1925年春，与共产党员宁积堂、李树贞同去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按照党的安排，到湖北二师(直系军阀刘佐龙部队)当兵。勤学苦练，操课为全连第一，被提升为中士班长。1926年4月，南下广州，参加北伐军，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三营九连代理排长。8月参加汀泗桥战斗，率领1个排歼灭吴佩孚4个炮兵连，受师传令嘉奖，晋升正式排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6月徐海东按党组织的指示，离开部队回乡闹革命，被中共黄眩县委派到河口区担任农民自卫军大队长。“七·一五”宁汉合流后，徐海东返回徐家窑，以窑工为掩护，秘密发展党员，先后在徐家店、上屋湾和邓喻咀建立党支部。10月带领13人袭击夏店雨坛寺“缉私营”，缴得步枪7支，建立农民自卫军。11月15日徐海东率自卫军驰援黄麻起义，在黄安县城遇见副总指挥吴光浩。带去的人枪被编入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徐奉命返回重新组织农民武装。1928年秋，任中共黄陂县委常委、军事部长兼夏区区委书记。

农历腊月 30 日，组织、领导了夏区“年关暴动”。暴动很快遭到国民党的镇压，徐海东亲属被杀害 17 人。徐海东带领自卫队员转移到黄陂塔尔岗一带，组织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

1929 年底，徐海东任第五教导队队长兼党代表。1930 年 5 月爆发蒋、冯、阎中原大战，鄂豫边区革命武装迅速发展，徐海东先后任赤卫军独立营营长、补充第六师师长、鄂东警卫二团团团长。1931 年 3 月，任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团团长。率部往来穿插于“赤区”、“白区”之间，给致以重创。敌畏之如虎，因呼之“徐老虎”。11 月红四方面军组成，徐海东任十二师三十六团团团长。1932 年 2 月第三次反“围剿”，该团守横川、豆腐店一线，会敌 20 多个团压来，战斗十分激烈、残酷，终以众寡悬殊，前沿阵地吃紧。徐海东甩掉棉衣，带头冲杀。经 3 天 3 夜苦战击退敌人大大小小 20 多次冲锋。坚持至第四天下午，红军全线反击，敌人溃退。10 月张国焘率中央分局、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徐海东率七十九团在西界岭完成掩护任务后，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转战至英山与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东路游击司令刘士奇会合，成立鄂皖工作委员会，组建东路游击师，任副司令兼师长。后改编为红二十七军，任七十九师师长。为了避敌锋芒，司令部采纳了徐海东“返回苏区，保存实力”的建议，率部掉转头来，打回鄂东。11 月 29 日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二十五军，任命徐海东为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

1933 年 3 月徐海东率领七十四师和军部特务营在郭家河、二道河歼敌一〇四旅两个团，俘敌 3000 多人，缴获长短枪 2000 多支。4 月在潘家河、杨泗寨与敌十三师、